

# 語碼混用

練美兒、李楚成 著

張圓 譯

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形成？一個成功佔主導地位的語言意識形態，和不太成功的語言意識形態有何差別？在一個社會中，語言意識形態和更廣泛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發展有什麼關係？我們對語言的看法和評估現今語言學狀況的當代觀點，又是如何生成的？

—— Jan Blommaert,

“The Debate Is Open,”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p. 9

名不正，則言不順。

—— 孔子：《論語·子路》

「語碼混用」(“mixed code”)長久以來由香港政府在官方論述中建構，被刻畫成為一頭陰險可怕的怪物。如不嚴格控制，禁止「語碼混用」在如課室的重要領域出現，它就會大肆蹂躪和毀壞一切，特別是年輕人的思想。一直以來，政府官員彷彿已經看透及記載「語碼混用」的性質及其一切壞影響：

我們並不希望年輕人受港式英語教育，而不是反對以中文或英文為教學語言，我們現時正致力避免港式英語教學。

——（前任）港督彭定康  
（《南華早報》1994年5月13日）

我們在課室裏必須禁止語碼混用，即常稱的「港式英語」，那根本不是語言。

——（前任）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  
（《南華早報》1998年3月14日）

我們會繼續努力，確保英文中學不會以雙語教學來提高標準……如發現校方教學時語碼混用，我們會要求他們轉用母語教學。

——（前任）教育統籌局秘書王永平  
（《南華早報》1998年3月15日）

有趣的是，鮮有人停下來，在大眾媒體問問以下重要問題：什麼是「語碼混用」？它看起來像什麼？它何時會被使用；它為何、又怎樣對年輕人的語言和認知發展有不良影響？「語碼混用」一詞剛被提出時，大家好像已知道它是什麼，似乎從一開始便沒有必要解釋，或探究其會否因應不同語境而表示廣泛不同的事物。這種單語簡化論主要建基於將「語碼混用」具體建構為當下教育問題的主因及罪魁（Luke 1992）。為「語碼混用」冠以污名的論據繫於根深柢固、常被視作理所當然的語言純粹主義（Li 1998），並因貶斥雙語課堂實踐為學習難題的主因（而非解決難題的策略）而更鞏固其意識形態。

我們將會在本文記錄「語碼混用」這個術語在香港的歷史發展，並質疑和解構它。我們繼而會建議將香港的日常雙語和多語實踐看作一種通過多重語言資源在語境中的有效運用的廣泛社會互動行為，而不是透過隱藏的意識形態來把「語碼混用」的修辭建構具體化。

## 語碼混用被官方建構為教育問題的首要原因

如果語碼混用在香港指的是在日常生活——尤以香港中學課室——同時使用廣東話和英語的習慣，那麼，年輕讀者可能會訝異於這樣的課堂實踐在1980年代的名聲要比現在正面得多。比如，1982年有名的「呂衛倫報告書」(Llewellyn Report)提議，政府可承認英文學校教授內容時其實廣泛地利用雙語講課，並認真地嘗試發展真正的雙語課程策略以改善實際情況。按一系列似乎回應了「呂衛倫報告」建議的研究結果，約翰遜(R. K. Johnson)把英文中學教室以L1(第一語言)和L2(第二語言)同時授課稱為「雙語轉換策略」(Johnson 1983)和「多語呈現模式」(Johnson, Chan, Lee & Ho 1985)。如果換用「雙語轉換政策」(Johnson 1983)的名稱，情況便會變為：學習困難的原因來自其他地方，在教室裏用L1和L2的作法會被視作老師和學生之間解決由於英語在社會經濟中佔主導地位，而英語語言資本在不同社羣中不公平分配的問題(Lin 1996; Lo & Lin 2015)其本土實用、有效的策略。

作為帶歧視地標籤雙語運用的官方說法，以及被臆造為教育和語言問題的主因，語碼混用在一錘定音的1990年教育委員會第四號報告(ECR4)中首次引起關注。當中關於語碼混用的評論其後被政府教育政策文件，及大眾傳媒關於語言教育問題的報道中重複引用：

然而，不幸的是，語碼混用在多數課室裏十分普遍……語碼混用應盡可能減少……這樣作的結果是學生可以根據適合他們的教學語言來分類。學生將會根據他們以哪種語言學習為佳而被安排在中文或英文教學班。

——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4 (1990)*, pp. 100–101

因此，在我們的教育問題中，「語碼混用」一直有着罪魁禍首的「官方地位」，並成為後來政府在1994年實施的MIGA (Medium of Instruction Grouping Assessment) 政策，和1998年實施甚具爭議的單語教學校本分流政策(有關政策詳參Lin & Man 2010；Lo & Lin 2015)的主要論據。我們有必要指出，「語碼混用」概念的建構在分散公眾注意力起了關鍵作用，社會因此沒有聚焦於政府有提升大部分學童英語能力的責任，讓他們可以受惠於英語教學——在香港的社會經濟語境中此乃重要象徵資本(Lin 1996)——這個複雜但至為重要的社會平等課題。通過把「語碼混用」建構為英文中學那些語文水平有限(limited-English-proficiency, LEP)的學生所面臨的學習困難的主要(如非唯一)原因，便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把學生分流到單語教育，使大部分學生(超過七成)分類到母語教學，並剝奪他們接受任何形式，在社會上被視為更優越的英語教育的機會。

這種單語簡化論主要是靠將語碼混用物化，和建構為當前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的基本根據才成立(Luke 1992)。這個作法通過一個名稱(語碼混用)，間接利用和確認語言純粹主義派根深柢固、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語言意識形態(Li 1998)，去將課堂裏的雙語教學實踐貶斥成學習困難的原因，卻並未把它看成解決此類問題的對策

(例如來自不同社會和經濟背景的學生的不同文化資本；詳參Lin 2000a、2000b、2001、2006)。從教室消除語碼混用隨之變成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案，而按社會資源而言是不公平的教育政策亦因「語碼混用」被建構為帶有貶義的概念，並暗中迎合對混雜語言的語言意識形態的譴責變得合理化。

## 重新想像「語碼混用」為多元創造和有效的社會行為

自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執政，官方語言教育政策的目標成為眾所周知的「兩文三語」——將語言和讀寫能力分為五種(兩文三語)。政府資源持續投放到從小學到大專的教育領域，以提高標準書面中文(standard written Chinese, SWC)和英文讀寫能力，以及促進英語、普通話(口語形式的SWC)和廣東話口語的發展。所有學生都被告知和教導廣東話是一種「方言」，並不適合書面交流。對小孩而言，按說話的方式來寫作本來很自然，但廣東話特別用字(Cantoneisms)在校內的學生寫作作業中卻被系統地禁止和清除。儘管書面廣東話被學校教育排除，仍無阻書面廣東話或廣東話文化的傳播與活力，在報紙和雜誌的「軟」部分表現尤為明顯，「硬」新聞故事次之(Li 2000; Shi 2006; Snow 2004)。書面廣東話的活力同方言在該地區的使用密不可分。直到1990年代，由於香港流行文化諸如粵語流行曲、卡拉OK產品和電視劇的風行，廣東話成為一種優越的「方言」。即使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年代可能伴隨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崛起而式微，毋庸置疑的是廣東話仍然是最具聲望的中文方言。

當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標準書面漢語，廣東話和英語之間滴水不漏的界限為教育考試體系所倡導時，在香港特區的中文報刊雜誌看到的讀寫習慣卻顯示出人們的跨語識讀能力。以下我們將再以《頭條日報》文摘為例展示這些實踐。《頭條日報》頗受市民歡迎，據稱是香港發行量最大的免費報紙。

就語言風格而言，一般期望是正規的「硬」新聞故事必須跟從標準書面漢語規範。社論和特稿可說亦如此，但有論者 (Shi 2006) 指出，香港書面漢語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HKWC) 的語法顯示出大量源自英語和廣東話詞彙語法的影響。

1. 標題：七一「散步」荷包出血 Dream Bear 捐到「乾塘」
2. Kelly 有朋友目擊昔日「頭號梁粉」劉夢熊 Dream Bear 高調現身銅鑼灣 (...)
3. 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嘢日好忙碌，上午出席完慶回歸酒會，下晝兩點半約咗個內地朋友喺柏寧酒店見面。DB 話因為司機放假，要自己搭港鐵落銅鑼灣 (...)
4. DB 高調現身，但就澄清唔係去遊行，但話遊行係好事，可以敲響管治者警鐘，仲話個女都有去遊行，唔會反對大家嘅表達方式。CY 上任一年，施政同市民期望有落差，DB 語重心長話：「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唔係明天會更燥！」 (...)<sup>1</sup>

---

1 Kelly Chu 著：〈Executive 日記〉，《頭條日報》，2013年7月2日，頁12。就像標準書面漢語一樣，以上廣東話用表意的漢字書寫。然而，簡體字主要用於中國大陸，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仍在使用的繁體字。此外，一些廣東話語素已

這個 Kelly Chu 撰寫的專欄有一個混搭的標題：「Executive 日記」。精通香港書面漢語的讀者會注意到，它不能清晰地分類為只以標準書面漢語或只以廣東話書寫。事實上，作者同時吸收了標準書面漢語和廣東話資源，以營造一種本土而多彩的眾聲喧嘩風格。標準書面中文的詞彙元素如下：

- 昔日
- 前全國政協委員
- 語重心長
- 明天會更好

然而，應注意的是，除「昔日」很少在廣東話口語出現外，其他詞彙都可在廣東話口語中找到。因此，很難說這些是嚴格的標準書面漢語或普通話特有詞彙元素。

在所有這些語言特徵之中最能吸引眼球的，是以英語作為附加資源來捕捉一些純標準書面漢語或純廣東話表達不來的有趣意思。這裏包括以 CY (發音為「C Y」) 來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新聞人物劉夢熊名字的字面翻譯「Dream Bear」(用了三次，包括照片標題) 之後被簡稱為「DB」(摘錄中用了三次)。這些跨語作法的例子既增強了「Executive 日記」專欄的語言運用樣式，也強化了作家 Kelly Chu 的三語身分。它們亦顯示當中所跟從的語言規範在眾聲喧嘩的口頭形態中明顯較有個性，非那些「正經」、分門別類的單語學校教育所能比擬。此專欄的語言運用樣式亦表現出受過教育的香港華人在非正式社交和網絡書面交流的潮流 (Li 2011)。

---

經用羅馬拼音寫成 (例如 hea, he3 懶散)。「粵拼」的音譯系統由香港語言學會發明和倡導，用於將廣東話語素拉丁化 (<http://www.lshk.org/node/31>)。

以上例子摘自一張報紙（《頭條日報》），其實在許多普及新聞媒體及廣告中，也可發現類似的跨語讀寫習慣；比方，以下是特別引人注意的標語：

5. 至 **fit** 安 全 駕 駛 大 行 動  
zi3 fit on1 cyun4 gaa3 sai2 daai6 hang4 dung6

6. 原 來 老 花 都 可 以 戴 **Con**  
jyun4 loi4 lou5 faa1 dou1 ho2 ji5 daai3 con

7. **KILL** 新 BILL

除報紙專欄和廣告，此類眾聲喧嘩、由方言主導的書寫風格在其他如資訊娛樂新聞故事和連環漫畫般的「軟」部分也非常普遍。

### 多語社會中的語域和語碼的流動和容易滲透的界限

如上文所展示的香港中文報紙專欄那樣，由明顯迥異的語言和語域混合的元素以及流動性，絕不是語言學的新事物。香港中文報紙「軟」部分內的語言運用樣式同樣有利用多種語言資源的特點：包括文言文、書面語、廣東話和英語，這種書寫風格叫作「三及第」，因1950年代一些中文專欄作家而變得普及。「三及第」由三種不同風格：文言文、書面語和廣東話混合而成，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或在臉書時代叫作「Like」）。人們欣賞的是利用多重語言資源，以並置多種社會觀點和聲音的流動表現成功傳達的精妙和幽默（黃仲鳴 2002）。這個趨勢從1970年代開始並一直持續，為了使意義更具創意，那些精通廣東話、標準書面漢語和英語的作家，會從他們

的語言庫選用不同元素，展現它們作為符號的潛能。這些作家的語言知識是個混合資源庫，而不是涇渭分明的語言或語域。這種風格也能見諸通常被視作「高質」媒體的報紙。這並不叫人意外，因為就說話方式而言，報紙雜誌「軟」部分的作者傾向以地方語為基礎來形塑語言運用樣式，藉此迎合讀者的風格偏好 (Bell 1991)。

嘻哈 (hip hop) 藝術家的獨立創作也有不少作品展示出有香港特色的「語碼混用」創意。比方，MC Yan 為本地一本年輕人雜誌所創作的作品 (圖 1)，便顯示出街頭塗鴉藝術和粵語說唱歌詞的實驗性結合：他以隱喻傳達政治信息，嘲諷中國立法限制香港的言論自由。背景照片隱約可見一羣警察在深水埗 (香港其中一個貧民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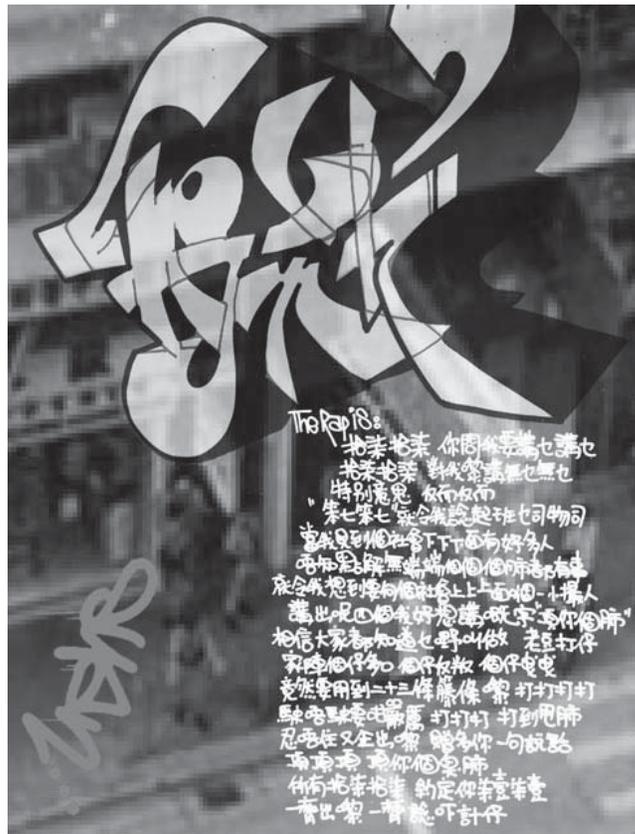


圖 1：MC Yan 作品。結合塗鴉和粵語說唱詞的創作。(圖片來源：MC Yan)

街頭圍捕一名行人。圖中左下角蓋上了MC Yan的街頭塗鴉標記：他的簽名SYan。粵語歌詞上的白色圖案設計由兩個以街頭塗鴉風格寫成，反時針方向倒轉九十度的中文字組成（意思是「十七」，即雜誌的名稱）。按霍恩伯格（Nancy Hornberger 2003）的雙語連續體來說，這幅作品模糊了口頭和書面語言、英文和中文、中文和粵語（英文字「The Rap is」放在中文的粵語歌詞前面）、接收和生產（例如說唱歌詞要同時讀唱）、微觀和宏觀分析（例如說唱歌詞的粵語韻腳結構及口語字詞形式的微觀分析，要配合這篇說唱歌詞如何表達抗議的社會政治脈絡的宏觀分析）的界限。

在意識形態的術語裏，以上香港的例子顯示出以下兩者之間一個有趣的對照：通過教育機構而延續下來的官方學校讀寫能力規範和標準，以及本地報章雜誌那些明顯忽視官方規範和標準的非學校體制實踐。這大可歸因於過去幾十年，出版工業對讀者高度敏感並由市場主導，廣東話語詞和其他因眾聲喧嘩的方言風格而別具特色的語言特點，覓得社會空間而繁榮綻放，讓三語作家有機會主動地挑戰自上而下的語言標準。因此，香港提供了一個的有趣案例：通過豐富多彩的話語行為而被表達，伴隨着沒有邊界的語言創造力的多重聲音在香港報紙雜誌的「軟」部分能夠活潑紛繁地成長起來。

## 結論

跨語讀寫能力看起來像什麼，以及為何雙 / 多語讀寫能力有需要被重新概念化，藉此抓住流動的、眾聲喧嘩的、沒有被劃分的讀寫能力之本質，仍是重要的研究課題。比如，在新媒體通訊迅速崛起的新跨語文化便是有待描述和探索的豐富領域。這些跨語文化和

傳統印刷媒體的跨語文化有何異同（如上述香港報章的跨語文化應用）？在這些跨語文化協商中，到底有哪種流動並有時矛盾的身分？在同一文本上，又有什麼不同的社會聲音和觀點被連在一起相互「對話」？我們是否需要改變傳統語言學、語用學和讀寫能力的分析工具，藉此更有效分析跨語文化實踐？這些問題需要語言學家和眾聲喧嘩 / 社會文化理論家努力共同研究。

簡言之，就像我們思考未來的研究方向一樣，所需要的是更多對眾聲喧嘩的敏感，能夠洞察社會文化的語言 / 文化分析。我們要逆轉主流媒體和官方話語賦予「語碼混用」的消極含義，發掘香港人以眾聲喧嘩的多重語言資源，最有效和別開生面的方式來傳意的創意和資源。按晚近有關跨語言實踐的國際研究（García & Li 2014; García & Lin 2016; Lin 2015）的發展來看，香港語碼混用的獨有特點可令她在多語眾聲社會中的人類語言創造力研究的國際版圖上佔一主要席位。

## 參考文獻

### 英文

- Bailey, B. "Heteroglossia."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lingualism*, ed. by M. Martin-Jones, A. Blackledge & A. Creese, pp. 499–507. London: Routledge, 2012.
-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M. Bakhtin*, trans. by 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Bell, A.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 1991.
- Blommaert, J. "The Debate Is Open." In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ed. by J. Blommaer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 Canagarajah, A. S. *Translingual Practice: Global English and Cosmopolitan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3a.
- Canagarajah, A. S.(ed.). *Literacy as Translingual Practice: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 London: Routledge, 2013b.
- Cummins, J.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Schools: The Case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ional report submitted to SCOLAR, Hong Kong Government, 1999.
- Gagni, E. D.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School Learning*.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 García, O., & W. Li. *Translanguaging: 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Basingstok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García, O., & A. M. Y. Lin (eds.). “Translanguaging in Bilingual Education.”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 5. Dordrecht: Springer, 2016.
-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Gumperz, J. “Ethnography in Urban Communication.” In *Interpretive Sociolinguistics: Migrants, Children, Migrant Children*, ed. by J. C. P. Auer & A. di Luzio, pp. 1–12. Tübingen: Narr, 1984.
- Heap, J. L. “Cultural Logic and Schema Theory: A Reply to Bereiter.” *Curriculum Inquiry* 16 (1) (1986): 73–86.
- Hong Kong Education Commission.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4*.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90.
- Hornberger, N. H. “Biliteracy Contexts, Continua, and Contrasts: Policy and Curriculum for Cambodian and Puerto Rican Students in Philadelphia.”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24 (2) (1992): 196–211.
- Hornberger, N. H. & E. Skilton-Sylvester. “Revisiting the Continua of Biliteracy: Internation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14 (2) (2000): 96–122.
- Hornberger, N (ed.).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 Continua of Biliteracy: An Ecological Approach.” In *Continua of Biliteracy: An Ecological*

- Framework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315–339.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3.
- Johnson, R. K. “Bilingual Switching Strategies: A Study of the Modes of Teacher-talk in Bilingual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s in Hong Ko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2 (3) (1983): 267–283.
- Johnson, R.K. *Report of the ELTU Study of the Oral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Anglo-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Hong K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 Johnson, R. K. & M. Swain. “From Core to Content: Bridging the L2 Proficiency Gap in Late Immersio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8(4) (1994): 211–229.
- Johnson, R. K., R. M. L. Chan, L. M., Lee & J. C. Ho.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Language Modes of Presentation, Spoken and Written in Form III in Hong Kong Anglo-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1985.
- Lemke, J.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Multiple Timescales in the Social Ecology of Learning.”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ed. by C. Kramsch, pp.68–87. London: Continuum, 2002.
- Li, D. C. S. “The Plight of the Purist.” In *Language in Hong Kong at Century’s End*, ed. by M. C. Pennington, pp. 161–18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Phonetic Borrowing: Key to the Vitality of Written Cantonese in Hong Kong.” *Written Language and Literacy* 3(2)(2000): 199–233.
- . “L2 lexis in L1: Reluctance to Translate out of Concern for Referential Meaning.” *Multilingual–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20(1)(2001): 1–26.
- . “Lexical Gap, Semantic Incongruenc, and Medium-of-instruction-induced code-switching: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Postcolonial Linguistic Voices: Identity Cho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ed. by E. A. Anchimbe &

- S. A. Mforteh, pp. 215–24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1.
- Lin, A. M. Y. *Teaching in Two Tongues: Language Altern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Research Report No. 3)*.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1990.
- . “Bilingualism or Linguistic Segregation? Symbolic Domination, Resistance, and Code-switching in Hong Kong Schools.”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8(1) (1996): 49–84.
- . “Bilingu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ed. by J. Cummins & D. Corson, pp.281–289.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a.
- . “Hong Kong Children’s Rights to a Culturally Compatible English Education.”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 (2) (1997b): 23–48.
- . “Doing-English-lessons in the Reproduc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Worlds?” *TESOL Quarterly* 33 (3) (1999): 393–412.
- . “Lively Children Trapped in an Island of Disadvantage: Verbal Play of Cantonese Working Class Schoolboys in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43 (2000a): 63–83.
- . “Resistance and Creativity in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in Hong Kong.”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2 (3) (2000b): 285–296.
- . “Symbolic Domination and Bilingual Classroom Practices in Hong Kong.” In *Voices of Authority: Education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 ed. by M. Heller & M. Martin-Jones, pp. 139–168. West Port, Connecticut: Ablex, 2001.
- . “Beyond Linguistic Purism in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Exploring Bilingual Pedagogies in a Hong Kong Science Classroom.”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0 (4) (2006): 287–305.
- . “Egalitarian Bi/multilingualism and Trans-semiotizing in a Global World. In *Handbook of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ed. by W.E. Wright, S. Boun & O. García, pp. 19–37.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5.

- Lin, A. M. Y. & E. Y. F. Man. *English Language Critical Review: First and/or Second Language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Hong Kong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COLAR), 2010.
- Lo, Y. Y. & Lin, A. M. Y. (eds.). "Special Issue: Designing Multilingual and Multimodal CLIL Frameworks for EF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8 (3) (2015): 261–360.
- Luke, K. K. "Mixed Code and Bilingual Teaching." (in Chinese) In *Issues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ed. by K. K. Luke, pp. 109–117. Hong Ko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2.
- Pennycook, A. *Language as a Local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0.
- Rampton, B. *Crossing: Language and Ethnicity among Adolescents*. London: Longman, 1995.
- Rubdy, R. "Remaking Singapore for the New Age: Official Ideology and the Realities of Practice in Language-in-education." In *Decolonisation, Globalisation: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ed. by A. Lin & P. Martin, pp. 56–75.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5.
- Shi, D. "Hong Kong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Change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16 (2) (2006): 299–318.
- Snow, D. *Cantonese as Written Language: The Growth of a Written Chinese Vernacul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treet, B. *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Social Literacies*. London: Longman, 1995.
- . "What's 'New' in New Literacy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5(2)(2003): 77–91.
- Swain, M. "French Immersion Programs in Canada." In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ed. by J. Cummins & D. Corson, pp.

261–269.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Schools to Keep English in Mother-tongue Compromise.” March 14, 1998.

———. “Warning against Language Mixture.” March 15, 1998.

———. “Teaching Medium Will Not Be Forced.” May 13, 1994.

## 中文

黃仲鳴著：《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香港作家協會，2002。